在这里，看到版本中的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北上，行至燕山，在三面青山的环抱中，见亭台楼阁，次第铺陈。在3年前，地图标记这里还是一座废弃的采石场；今天，这里已是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近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历时3年建设，均已竣工。除了中央总馆，各个分馆也都与山水相依：西安分馆南倚秦岭，北望渭川；广州分馆在凤凰山麓、流溪河畔；杭州分馆更是坐落于良渚之间。

什么是版本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版本"？

在中华版本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版本的载体千变万化。从早期的刻符甲骨到纸质书，再到新兴数字媒体，陶石、兽骨、金属、竹木、纸张、数字……皆可作为版本的载体。器物形态和纸张形态的版本，依然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一环；而数字版本，则开辟了新的存储空间和展示形式，为版本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尽管版本的形态缤纷多样，但其承载信息、传播知识、促进交流的作用始终如一，是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跟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脚步，探访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馆中有版本万千、气象万千、文明万千。

①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阁文瀚厅
②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③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阁

本文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斯文在兹

文兴楼是中央总馆的入口，也是系列展览的序厅；穿过文兴楼就到了文华堂，这里是国家书房，珍藏着3万余册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作为整个建筑群的制高点，文瀚阁位于建筑群中轴线的北端，坐落于台基之上，借鉴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庄重典雅。

中国各个朝代都把版本保藏传承放在重要位置，从周朝的守藏室、秦朝的石室，到汉代的天禄阁、唐代的弘文馆，再到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清代的四库七阁，专藏机构绵亘千年。其实，建筑也是一种版本，建筑中充满了人对天地万物的想象与尊崇。

中央总馆的展览有"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典版本展""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见证伟业——中华民族复兴版本展"，以及"版本工艺""中国邮票""中国货币"等专题展览。

其中，"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基本陈列，荟萃中华文明起源、政治、经济、哲学、地理、文学、史学、艺术、科技、教育、军事、民族、交流等13个方面的版本瑰宝。版方鼎、《放马滩秦图》《元和郡县志》《明状元赵秉忠殿试卷》等文物，记录了不同领域的古代文明版本。

一片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片，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上面的刻画符号，具有文字性质，是探讨文字起源、社会形态的重要版本。

一块青铜的秦诏版，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为研究秦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版本物证。

一副清代的象牙扇骨，采用微雕技法，在一侧骨上雕刻了白居易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共计840余字。

赓续中华文脉的经典版本浩如烟海，蔚为大观。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版本遭遇了侵蚀损毁。幸好，在一代代的能工巧匠的装裱修复下，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版本之美得以延续，技艺本身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华堂南广场，有一枚"赓续文脉"印章雕塑，由边长1.6米的整块寿山石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枚寿山石印章。这枚印章印在了大地上，那是中国版本的最大载体。

从"铅与火"跨进"光与电"

印刷术的发明，让版本的复制传播进入了新的时代。

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是中国手工业技术发展中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印刷术传入之前，雕版印刷一直是中国版本印刷的主要形式。雕版印刷术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工艺，它在中国的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多种技术的合力之下诞生。它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而活字印刷术则是近代印刷术的先驱，由北宋平民毕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掀起了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展览中展出了一块德格印经院的经版和印刷的佛经，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一册藏传佛经的西夏文译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991年出土于宁夏，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用实物证明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前到了宋代。

在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约400年后，德国人古登堡创造了用铅合金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法，并制造出最早的印刷机。19世纪初，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得以普及。

一册《十竹斋画谱》，即由民国时期的上海江东书局用五色珂罗版印刷，而画谱则是晚明时期金陵的"十竹斋"主人胡正言主持刊印的。技术在进步，文化也以不同的载体展现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由北京大学教授王选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诞生。所谓激光照排，其实是电子排版系统的简称，它的原理是将文字通过计算机分解为点阵，然后控制激光在感光底片上扫描，用曝光点的点阵组成文字和图像。中文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跨进了"光与电"的时代。

邮票：用实用而微小的方式记录中国

有一种版本的类型，曾经我们经常使用，现在却渐渐淡出视线，那就是邮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通信的国家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边境寄往王都的"边报"。《孟子·公孙丑》中，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邮传通信已经较为完备。自秦汉以来，历经各个朝代的发展，至大清邮政开办之前，邮驿制度日益完善，保证着国家政令的畅通。

展览中有一封特殊的"家书"——黑夫木牍，那是战国时期名叫黑夫和惊的秦国士兵，写给家人的书信，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也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邮驿，不仅有国家大事，也寄托着普通人对远方的挂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78年，由西方列强掌控的清朝海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今营口）、上海等五地试办邮政，同年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批准开办国家邮政，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标志着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诞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邮政取代大清邮政。当时的邮票品种丰富，有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航空邮票、附捐邮票、欠资邮票，以及限地方贴用邮票、地方邮政邮票等。在那个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经济混乱的年代，邮票"加盖改值"与"限地区使用"的情况较为普遍。邮票用实用而微小的方式，记录了当时的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邮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0月8日，新中国第一套邮票——纪1《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正式发行。

从此，在中国的邮票上，我们能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画卷。

邮票可能是所有展品中最"新"的，比如，2018年10月30日发行的《港珠澳大桥》、2020年10月25日发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还有2022年7月27日发行的《中国国家版本馆》……

也许今天的我们已经很少手写信、贴邮票，也许邮票将来会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但它依然在兢兢业业地记录着版本中的中国。

岳麓

□ 程遂营

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规，或称学规、学生守则，很多学校还印成小册子叫《学生手册》。那中国古代书院的"校规"，又是怎样的呢？其中，《岳麓书院学规》就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王文清（1688－1779年），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乾隆二年（1724年）进士，精于经史，名望很高，乾隆十三年（1748年），受长沙知府吕素高聘请，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当时，岳麓书院生源不济，院舍草木丛生，尤其是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与长沙知府吕素高不和，有意利用城南书院（长沙的另一座书院）取代岳麓书院的地位。所以，岳麓书院的发展到了一个低谷。

王文清到任后，整理院舍，整顿院规，依靠个人声望，扩大生源。在王文清的努力下，那些读书士子争先恐后地打理好行李，从湘江西岸的城南书院，渡江来到湘江东岸的岳麓书院。长沙地方政府也把岳麓书院重新当作举行祭孔等文化活动的中心，岳麓书院得到了中兴。

不过，王文清对岳麓书院的最大贡献还不仅仅在于中兴，而在于他修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学规共18条，108个字，内容分两个部分：前10条是学生的道德行为规范：忠、孝、庄、俭、和、悌、义等；后8条是具体的学习内容和方法：讲经、诵读、做笔记、通晓时务等。学规很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我们看其中的几条：

第一条，要求学生"时常省问父母"。中国的孝文化根深蒂固，书院的学生来自湖南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所以，要求学生用书信、或托友人、或隔一段时间返乡等形式，时常省问父母大人的安康。

第三条："气习各矫偏处"。书院学生都是10多岁、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性的塑造形成期，所以，要矫正个人行为中的偏执，养成与人和睦共处的习性，这一点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第五条："服食宜从俭素"。封建社会，一般的老百姓是上不起学的，能到书院读书的大多是比较富裕家庭的孩子。王文清认为，年轻人应该过节俭、朴实的生活，不能在服装、饮食等方面太奢侈，这样，才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将来走向社会才能为国家、为广大百姓考虑，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而不是奢侈腐败的蛀虫。

还有"读书必须过笔""疑误定要力争"，是提倡学生读书时要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这是古人学习的一个好方法；同时，有疑问一定要提出来，善于发现问题，通过争论、辩论来弄清楚问题的实质。

即使放到今天的大学，《岳麓书院学规》也很有借鉴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文清还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对于学生教育的重要性。曹典球《王九溪先生年谱序》记载，王文清"一生不肯为凿空无据之谈，而必以实事求是、切于人生日用之学为归宿"。

在18条学规的第十三条，王文清明确提出，书院的学生应该"通晓时务物理"，就是提倡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为将来经世济民打下良好基础。

不过，这一条学规不是王文清首创的，岳麓书院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办学宗旨，教育学生重实践、行践履。清朝学者全祖望在评价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号南轩）时说："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即注重实践、关注社会的经邦济世之学。

到了清代，考据学盛行，但岳麓学子在王文清等人的倡导下，仍讲求义理和经济之学，把重务实、行践履的学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对于《岳麓书院学规》，岳麓书院后来的学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都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学识渊博，但又强调务实，传承了传统儒家经邦济世的情怀与传统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面向现实，关注国计民生。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岳麓书院 视觉中国供图

《西游记》为什么成为经典

唐僧与猴行者，甘肃瓜州榆林窟第3窟。
本文作者供图

□ 竺洪波

君不见，西游文化从不过时，在每个年代都可以凭借其独特魅力融入时代：央视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连年位居各视频网站播放量前列；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电影《大话西游》、网络文学《悟空传》，以及各种戏谑的"西游"作品，乃至"西游"表情包，都是这部传统文学经典与时代、与社会、与各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神共振。

与"四大名著"或"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三部相比，《西游记》具有独特的魅力。从读者面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具有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红楼梦》则有不同程度的"少儿不宜"，唯独《西游记》能与大众产生全方位的共鸣。无论男女老少、黄发垂髫，都可以津津有味地与人说起《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的独特魅力、它的艺术经典性是如何炼成的？《西游记》不是"天降"奇书——它有来历可寻。

其一，文学源于生活，经典来自现实，《西游记》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关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各类史书记载略有差异，可大致梳理为：

贞观三年（629），玄奘从首都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和大量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丝路南线回国，逗留于阗（今新疆和田市）两年后，回到长安。

行程5万里，途经百余国，历时17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导航、没有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西域的17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异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佛教理论。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故事"。史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被形象化为"九九八十一难"："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艰难旅程，化为笔底烟霞。古人评论《西游记》"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具备"，揭示了《西游记》宝贵的审美精神与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这一"中国故事"独特的叙事方式。

其二，《西游记》的经典性来自时间的赐予，这部作品经历了长达千年的经典化历程。

早在唐初玄奘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有所流传。取经归国后，玄奘奉敕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域地理、历史、道里、风俗。他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了表彰恩师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一记一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传主行迹神奇，书者文采斐然，共同开启了"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西游记》的最早源头，也成为《西游记》经典化的开端。

沿着时光长河缓缓流动，晚唐五代到宋元之际，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西游文艺作品。开始时，大家各显神通，各有讲法，严肃的历史真实、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活泼的民间传奇，融汇交织。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渐趋于一致，出现了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

此后，民间艺人再讲说西游故事时，大致都按这个话本底稿来讲说。现存《诗话》的产生时代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宋，有人说是元，也有人认为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这部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诗话》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游题材的文学文本。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

《诗话》对《西游记》最终成为经典性神话小说具有奠基性、先导性的意义。比如，正是在《诗话》中，猴行者首次加入取经行列，替代玄奘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个猴行者来头可不小，他来源于民间西王母神话，人、神、猴三位一体，是"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通广大，"九度见黄河清"，因偷吃王母的蟠桃被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显然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紫云洞则在《西游记》升级为水帘洞。

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直接影响了《西游记》的内容和结构。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阻碍，必须引入妖魔鬼怪，才能显其神通；随着妖魔鬼怪的出现，唐僧的保护者也须相应升级，于是引入了西天诸神；一般的得道高僧只是精通佛理，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在猴行者与神魔面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祖，而非历史上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胜任。就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从此，西游故事的内容和结构驶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

《诗话》还开启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将玄奘取经的历程浓缩为更具象征意义的"九九八十一难"。据考证，现存《诗话》中的降妖历难故事，完整的有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等"三难"。"三难"虽少，但意义重大：它将历史上玄奘所经历的"百千无以备叙"的"此等危难"，演化成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为后世《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发达、丰富，逐步形成了戏曲与平话（民间说书话本）两个系列，现存的代表作分别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这两部作品是明代《西游记》演化的"关键少数"。从时代考量，它们离《西游记》最近，又同属于叙事文学体裁，适合讲述，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直接蓝本。

《西游记杂剧》，明初戏剧家杨景贤著，全方位叙述了唐僧取经故事，具有六本二十四则的宏大规模，比王实甫"天下夺魁"的《西厢记》还多出一本，可谓元明以来杂剧之冠。《西游记平话》，明代无名氏著，全本已佚，目前仅存一些片段，主要是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载"车迟国斗圣"两则。后者还有9条注释，涉及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丰富。

《诗话》尚无猪八戒和白龙马的影子，沙僧的情形则更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但在《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中，"取经班子"的构成及其分工则已经定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越来越庞杂，但"取经五人组"的班子始终相对稳定：师徒四人，外加白马，定格为《西游记》的"标配"，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而过。

同时，《西游记》的情节构架也宣告固化，为大众所熟知、独立成篇的《西游记》"三大板块"就此定型。这"三大板块"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取经缘起）和唐僧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

其三，《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作家吴承恩的生花妙笔。

当下学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说法还存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西游记》的作者是客观存在的。据鲁迅、胡适的考证，最后创编并推出《西游记》百回本巨著的，是明代作家吴承恩。所以，我们不妨将"吴承恩"当作《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用以考察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创造。

与《红楼梦》等文人案头文学相比，《西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

吴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独立创作型作家，而是像冯梦龙、余象斗一类的改创型作家。在对以往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加工和润色的过程中，吴承恩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彰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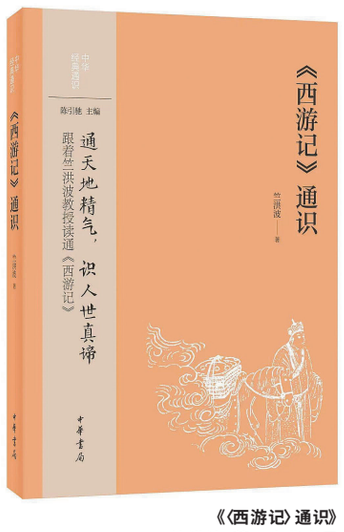
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前代杨致和简本《西游记传》中不足300字，而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使故事更加饱满生动，文字更加神骏丰腴；白骨精的故事，虽在前代《诗话》里早有雏形，但白骨精善于伪饰变化、千方百计"吃唐僧肉"的情节，则完全是吴承恩的构思。

此外，从理论上说，凡是前代西游作品中没有出现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坠水、荆棘岭三藏谈诗等故事，都是吴承恩独立创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称道的是，正是吴承恩，才将《西游记》写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神话小说。按以往文学史的命名规则，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大概率应该像《马可·波罗游记》或《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或者，从"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为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是历史选择、创造的结果，更是吴承恩选择、创造的结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游记〉通识》
竺洪波 著 中华书局